

抗戰四年來的軍事與政治

徐同鄴

七七蘆溝橋事變，展開了全民抗戰的偉大場面，轉瞬已足四年，在此四年中，中國失去沿海沿揚子流域各省市，想到這樣廣大的肥沃土地被敵人占領，這樣衆多的炎黃子孫被敵人蹂躪，我們內問神明，是對不起淪陷區同胞的。但是轉過來一想，希特勒的金戈一揮，歐洲十四國望風披靡，中國還能巍然獨存繼續抗戰，一方面固然是暴日的武力遠比不上德國，一方面也是中國列祖列宗留下來這麼大的一份遺產，使我們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不過失地之多，倘與歐洲相比，何止區區十四小國，我們痛定思痛，應當如何的奮勉惕勵，來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。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筆者爲國民黨黨員，尤當負起雙重責任，不忍軍紀黨紀之敗壞，政治綱常之失調，爰就四年來耳聞目接之事，條陳一二。

一 軍事

119289

(一) 前方軍事 四年以來，國軍打了不少勝仗，這是事實，打了不少敗仗，這也是事實，但使人失望的是一般輿論泰半歌功頌德，自欺欺人。其實兵家勝敗，古之常事，無庸諱飾，祇要能時常反躬自省，檢查弱點，設法糾正，則雖敗猶榮，所怕的是祇看到敵人的短處，不知道自己的短處，那才不可救藥。有一位張永懋先生，在作戰回來，很率直地指出軍事方面的幾個弱點：(1) 配備部隊的失當：我軍使用的武器，比敵方實在差不了多少，至少應打個平手，然而敵人一下總攻令，我們祇得轉移新陣地，其中最大原因是我方部隊的素質，尙未達到水準時就拿去作戰，他主張作戰部隊一定要富有戰鬥力才行。(2) 空軍少與陸軍協同作戰：空軍到前方作戰，往往出以單獨行動，敵方則不然，先有飛機天天在空中偵察，并向我陣地投彈，一到陸軍進攻的時候，即整日不斷的轟炸掃射，一方面掩護陸軍前進，同時壓迫我軍，並阻撓我增

援部隊的活動，他希望我方空軍以後應與陸軍發生聯繫。(3) 戰區漢奸活躍，各部隊都設有政訓處，他們負有聯絡民衆掃除漢奸的任務，無如事實上政訓處變成一個祇吃飯不做事的贅瘤機關，此後應切實努力於應盡的職責。(4) 軍官玩忽職務，少數中下級軍官在前線大吃大喝，大打麻將，一旦聞警，手忙腳亂，他認爲最急要的是上級軍官要嚴格詰誡並親身巡查，如發現玩忽職務者不惜殺一儆百。(5) 士兵欠餉，士兵薪餉起碼拖欠一二個月，他親自聽到幾個開小差的士兵說：「我們五月份的餉都沒發，就能叫我們打七月份的仗嗎？」(6) 傷兵缺乏救護，戰線上的傷兵，在我軍轉移新陣地時，十分之六七是委棄而去，把他們的命運交付給殘酷的日人手中。他提出以上六點，希望不要諱疾忌醫。

此外顧傳泗先生對於南京的失陷，認爲有二種原因，其一：是當時負有城防責任的衛戍司令，不能實踐他的諾言，其二是軍隊統率關係。他說：假如這位衛戍司令，平生是個忠信篤敬的模範軍人，未曾投過機，未曾倒過戈，一定會度德量力，自訂一個有限度的承擔，而絕對不會言過其實，妄承大命，因而鑄成喪師失地之錯的。顧先生認爲將領人選，須於才能之外，注意他的品格或私生活，假如是「執德不宏，信道不篤」的，絕對沒有「死守不去」的精神，這種人縱使他小有才能，貌爲恭順，臨難是斷斷靠不住的。尤其要注意的是他生活狀況，儘管這人在以前是不怕死的勇將，但是如果銀行裏已存了幾百萬存款，已造了若干高大洋房，已娶了幾位如花如玉的姨太太，就不必再打算他爲國家賣命了。我們不必向別處找，祇要在渝蓉兩地看看，有不少銀行是軍人開的，有不少洋房是軍人造的，他們的氣節早已消失在溫香軟玉中了。所以蘇聯紅軍以團長以下的軍官擢升爲指揮官，雖然經驗較差，但血氣方剛，不致臨陣退卻，這倒是值得研究的。總理在「軍人精神教育」

中亦說：「若無精神，子彈雖多，適以資敵，一旦臨戰，委而棄之，非為敵人運輸戰利品乎？故兩國交戰，能撲滅敵國之戰鬪力者，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，而使失其戰鬪能力。兵法有言，攻心為上，攻城次之，攻心者，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，取得城池，猶其後也。」

(二)後方軍事 我們且不談兵役之類的大問題，單就治安方面說，已是毫無法紀，到處漢奸放火，匪警重重，例如成都為省會所在，離城一二華里，已覺盜匪充斥，我在成都二年半，鄰居及房東共遭盜劫六次，破案二次，計西門外二里許羅家碾趙戴文孫震公館劫案當場格斃一匪，東門外五桂橋某科長公館劫案事後鎗決四匪，伶人劉奎官家盜案等迄未破獲。四川本屬多匪之地，但抗戰以來，國府西遷，地方軍事當局早應籌有安定秩序辦法，不圖漢奸盜匪踵接而至，吾人在今日，前有敵軍，後有盜匪，上有轟炸，下有鼠竊，外加糧商之壓榨，土劣之魚肉，雖數千年來受慣帝王奴役之臣民，到此亦要作不平之鳴，初猶以謂成都特有之現象，旋知重慶也是這樣，甚至報人張季鸞先生亦不免於盜匪之擱劫。後方軍人，既不能效命疆場，亦當為治安盡瘁，始無負於民衆嗚呼之望。

一 黨務

我們身為國民黨員，想起黨內情形，不得得不毛髮聳然，在開會時同樣會朗誦總理遺囑，會講述國父遺教的人，現在投入敵人懷抱的已不少，除中央正式宣布開除黨籍及國府明令通緝的一大批漢奸頭目外，其餘低級的叛黨份子，不知究有多少。這些漢奸頭目在過去大都身膺國民黨重寄，虛聲盜名，而人格墮落，一至於此，可證過去黨內組織不夠嚴密，漢奸敢探，竟能明目張膽，在黨內混迹數十年之久。抗戰以後，其叛逆已著者，仍未予以制裁，姑息養奸，優柔寡斷，此為黨紀未能正肅所致。今後當如何嚴密組織，以防範投機份子，如何整飭紀綱，以淘汰腐敗黨員，如何加強訓練，以發揚民族氣節，如何言行一致，以實踐總理遺教，均為我國民黨黨員應各本良心一致努力之標的，其以黨籍為護符，主義為幌子，而謀升官發財者，吾人亦以準漢奸目之。總理在生前早已給我們定下淘汰腐化黨員的標準，他說：「沒有革命

之前，各黨員已經知道有抄家滅族的危險，還要加入來救國，故在革命前，他們的人格，是被人歡迎的。到了革命之後，各黨員知道沒有抄家滅族的危險，祇有升官發財的好處，所以份子越變越複雜……要想方法來淘汰他們。」我們從總理的訓詞中得到的結果是，凡想升官發財或已升官發財的，都是投機份子，應該在淘汰之列。他屢次誥誡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發財，他說以黨治國，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，然後中國才可以治，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，中國然後才可以治。簡而言之，以黨治國，並不是本黨的黨員治國，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。我們試檢討一下，現在到底是黨員治國，還是主義治國，如說是主義治國，直接民權，平均地權，縣長民選等等的影子，在那裏？總理在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日說：中國還是官治，政客治，武人治，不是民治。到今日為止，又何嘗是民治呢？我個人對於國民黨同志的希望，是先義後利，不要祇圖自己的地位，不管國家的地位，投機份子貪污份子都該肅清出去。

二 政治

抗戰以來，各專家對於政治問題，頗多發揮，而歸根結蒂，不外乎人事。陳之邁先生「論政治上的盡其在我」說得非常透闢，他指出我國現在依然沒有做到政治「制度化」的一點。關於人事問題，他指出兩點：第一，真正能夠效忠國家，真正有為有識的人物，特別在這個時候，應當受政府隆重之重負，起最艱巨的責任來。張純明先生「論政治設施應制度化」也特別指出政治的進步離不開人的原素。薩師炯先生「論政治建設」也着重在人事。他說政治是整個國家機構的原動力，而發動和管理這個原動力的，又是「人」。如果沒有健全的人，即使有最好的機構，或者也不會發動，甚至將機構弄壞。錢端升先生亦曾專題討論「抗戰致勝的途徑」，他深信長官如得其人，而有專責可負，則其下亦必多賢能，循良之輩。反之，如果在上者不得其人，則不論法令如何嚴密，紀綱仍必難整，貪污仍必難除，所以必須使行政人員均為賢人，然後官紀官常，宦風仕習可以明朗化。薩師炯先生認為中國的政治建設，最重要的莫過於建立並厲行良善的吏治制度，以澄清混沌局面。

他提出幾個辦法：第一，全國公務員的任用，應該是一律由於考試。過去考試制度的失敗，除了薩先生所指出的政府並沒有樹立考試制度的威信，各機關歧視考試出身的人，所考的課目與試題不適當等等缺點外，亦有許多機關，藉口業務不同，自行制定一種考試，以為抵制外似大公，陰實偏私，致不學無術者亦可名列前茅，而有真才實學者甚至不予參加考試之機會，不云年資未足，即云考績不佳，以致升遷無門，長居末秩。第二，一切官吏的進退，必須有嚴密的考銓制度，任何人都具有上進之心，他發現他的職業在實際上已經沒有上進希望時，上焉者別求出路，下焉者抱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」的態度，別求出路也要有門路可走，有背景可靠，十九還是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」，以致公務機關無一不死氣沉沉。第三，必須嚴刑法以懲治不法貪污的官吏。以公務機關薪酬之薄，而渝蓉各地的許多官吏，還能酒肉徵逐，他們的錢從那裏來，不能不令人懷疑。黃六平先生論「公務員保障問題」，也有類似的見解，他舉出小職員無保障之結果為官如傳舍之習，人懷五日京兆之心，人之狡者，則另闢途徑，用其卑鄙手段，如請謁於私室，獻殷勤送禮物，其甚者，美女與支票，結果，不肖者在位升官，賢者碰壁失業。對於人事說得最痛快的，莫過於盧郁文先生「人才的反淘汰」一文了，他引用貨幣學上的格萊斐法則來說明惡才驅逐良才，全國公務機關的癥結，可說是被盧先生一言道破了，他對於惡才驅逐良才有如下的說明：「甲守法而乙徇情，徇情者上得受寵於巨室，下無招怨於流氓，因承恩而見陟，守法者上杜巨室方便之門，下塞流氓作惡之路，因公怨而見黜，是徇情驅逐守法。甲廉潔而乙貪污，貪污於貨悖而入，亦悖而出，以貪污所得，廣行賄賂，雖然政聲狼藉，無礙於步步高陞。廉潔者非義不取，亦非義不與，兩袖清風，無可交結，公務上稍有疏漏，即難免於降級革職，是貪污驅逐廉潔。有品者不肯折腰而見疏，無品者因工逢迎而見用，是無品驅逐有品。有能者因勇於任事而得罪，無能者以但求無過而邀功，是無能驅逐有能。」盧先生所述均屬最普遍之現象。貪污之風，以近年為尤甚，大抵皆主管長官，利用職務上之權力，盡量搜括，貪污之數，與其官階成正比。權法網者雖比比皆是，而逍遙法外者實居多數。廉潔自持者，既無可結納，往往服務一二十年而不得陞遷，因此良才非歸於鎔化，即歸於

退隱。盧先生提出三點：（一）用人要考試與公開荐舉相輔而行；（二）用人要信專而久於其位；（三）綜核名實，其道有三：（1）授任必求其當；（2）職責劃分要清；（3）考成務求實際。

四 糧食

目前各種問題中最嚴重的莫過於糧食，而糧政的惡劣，無逾於四川。四川為產米之區，為國府所在，為交通發達之地，以理度之，宜乎令出必行，而事實適得其反，愈統制而糧價愈高，雖原因複雜，然人選不當，執行不力，則為不可諱飾的事實。因為四川並不缺米，單以成都平原十六縣來說，每年產白米五百萬市石，除自用半數與輸出一百二十萬市石，及軍糧四十分之一外，至少可餘一百二十萬市石，但成都前幾個月一直無米上市，低級公務員家屬都以黍米山芋充飢。目前雖已有米，每石曾漲至八百餘元，各專家所提方案，大都不着邊際，無非是希望糧商合作，叫人民鎮定，殊不知囤積糧食的並不一定真是真正商人，而是在政治上金融上有特殊地位的人，希望他們合作，豈非緣木求魚，叫人民鎮定，先要安定民生，沒有飯吃，如何鎮定得下。平民每日糴米而食，決無餘資可以競買，不能談過於心理作用。且抬高米價之現象，祇限於四川，中央應以雷霆萬鈞之勢，對四川糧食問題作一勞永逸的措置。如果優容姑息，結果會影響到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仰，間接的會影響到抗戰前途。重慶大公報，提議以事實變更人民心理，政府管理糧食，就應當自己手裏有糧食，這樣才能控制市場。

糧食發生恐慌，以委任階級的小公務員獨蒙其害，至於達官貴人，富商巨賈，地主豪紳，殷實農民，多數圍有糧食，無不渴望糧價高漲。薦任以上，即使不兼營商業，亦已入主管長官之列，於優厚月薪之外，有長官加薪，有辦公費，有特別津貼，有汽車津貼，有公差費，有種種巧立名目之津貼，綜而計之，已超過原薪若干倍。柴米油鹽，有庶務人員為之奔走採辦，起碼職員大抵係初出茅廬，單身居多，雖薪給有限，津貼較多，伙食而外，尚有餘羨。惟委任階級之小公務員，月薪一二百元，津貼已輪不到，多數有室家之累，父母未死，子女成羣，八口之家，靠此一二百元收入，仰事俯畜，以石米八百元計之，僅能易米一二

119292 斗，瞻此嗷嗷入口，平均每日得數粒米而已，斯誠讀書人亙古未有之浩劫，確有「十載寒窗，不如一根扁擔」之嘆。小公務員在抗戰過程中所貢獻的，不為不多，大自國防計劃，小至例行公事，莫不出於小科員之殫精竭慮，何可

中國之統計事業

朱君毅

一 引言

基本國勢之觀測，人力物力之動員，建設之計劃，財政之統籌，預算之編定，政績之考核，端賴精確詳明之統計數字為其基礎。故國民政府成立，設主計處置統計局，專司其事。蓋應用統計以策畫行政之設施，考核行政之效果，估量行政之價值，鑒往偵來，功用至宏。況值茲抗戰建國齊頭並進之時，行政三聯制急待推行之際，統計之應用與需要，尤見殷切，則統計之重要可知。而我國統計事業之現狀，想亦為國人所樂聞。茲特應東方雜誌社之請，勉為是篇，藉以檢討過去，敘述現在，與策勵來茲也。

二 中國統計事業簡史

我國統計之學，稽諸史乘，淵源甚早。夏書禹貢，篇劃野分疆，詳載九州之土壤方物，即其濫觴。而政府統計，遠溯周官，司徒稽國中及都鄙夫家，登其衆寡，六畜車輦辨其物，歲時入其數，以施政教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。自秦漢以降，政弊法弛，成規浸失，統計資料散見於歷代官書者，亦復不少。惟當時雖有統計之實，而無統計之名。明清兩朝，雖有詳盡之戶籍統計，然僅載丁男，實不足以代表人口之全部。雖有史冊所載之農田統計，亦僅及科稅之地，而非耕地之全數。即財政上之收支，雖有李吉甫之元和國計簿等，亦祇以供帝王之披

令其枵腹從公，目覩父母子女之飢寒以死，為今之計，惟有從速實行計口授糧，以杜絕囤積操縱之路，否則即使管理糧食的機關林立，也祇好畫餅充飢而已。

覽，而無關於政治之公開。故海通以前，我國統計之學，遂致晦盲否塞，乏人注意。統計事業遂停滯而莫由進步。近代式之統計，實傳自西歐，可謂肇端於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年）創刊之海關冊，歷年以來，內容雖時有增減，然迄今尚未間斷，誠為今世研究我國貿易統計者唯一之藍本。至我國政府正式設立最高統計機關，實始於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年）憲政編查館內設立之統計局。兩年後，京內各部及大理院，復先後組設統計處，各省亦次第成立調查局，均受統計局之指導。此外各司、道及府、廳、州、縣均經規定設立統計處，並受調查局之指導，成為一貫之系統，是為我國統計定制設官之嚆矢。是時重要之調查統計工作，厥為宣統年間民政部舉辦之戶口普查。緣光緒三十四年，清廷以籌備立憲，意在和緩革命風雲，乃參考歐西各國成例，公佈編查戶口章程，先查戶數，後查口數，翌年（宣統元年）據以實施。其結果歐美學者如韋爾考克斯（W. F. Willcox）洛克希爾（Rockhill）諸氏，均認為有清一代較為精確之材料，甚至有以此為藍本，進而估計我國人口之總數者。詎此次調查，雖頗能深入民間，差勝於清代之戶籍編審，而為我國人口普查開一新紀元，但因原報告偏而不全，整理時又多錯誤，故戶口數額欠缺疏漏。況滿清政府，於調查人口時所抱之政治偏見，及當時官吏之敷衍塞責，其結果之不能精確，實屬顯然。此外農工商部亦曾完成二次農工商部統計表，學部及郵傳部亦均編印各項統計圖表，稍稱完備，足資參考。

民國改元，中央政府各部皆先後設置統計專科，辦理調查統計事宜。民國三年總統府政事堂，曾有主計局之組織，惜非統計中心機關。迄至民國五